

家族涉入、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研发投入

李荣 陈琳 张玉明^①

【摘要】 基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利用1745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并探究了企业国际化战略(地区多元化的一种)、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其组合的情境作用。结果发现:家族涉入阻碍企业研发投入;国际化战略缓和了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作用,但产品多元化战略加剧了上述阻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同时采取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可以缓和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作用。上述结论说明,不同类型多元化战略的作用不同,应重视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及其后果。

【关键词】 家族涉入 研发投入 国际化 产品多元化

Family Involvemen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R&D Investment

Li Rong Chen Lin Zhang Yu-m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gency theory, resource-based view and 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using 1745 sets of data of Chinese family-controlled listed fir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R&D investment.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 how the above impact depends o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two.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Family involvement blocks R&D investment; (2)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is weaker with higher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while it becomes stronger with higher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will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R&D investment.

Keywords: Family Involvement R&D Investment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一、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背景下,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已有研究显示,保持足够的研发投入,进而获得技术创新成果,对于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并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凌玲和卿涛,2013; 龙文滨和宋献中, 2014)。为了探究企业研发投入活动的机理,许多研究关注了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前因影响,发现家族控制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决策(Block, 2012; Gomez-Mejia et al., 2014)。

在聚焦家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家族控制与研发投入间直接关系的看法不尽相同,而对该问题的情境变化选择更是迥异其趣。在直接关系方面,经典文献认为家族控制可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James, 1999)并巩固社会网络(Carnes & Ireland, 2013),进而提高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动机与能力;但家族控制也会增加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缩小企业社会网络规模并将家族情感考虑代入研发决策,从而削弱研发意愿与资源。而在情境因素方面,经典研究主要关注了绩效困境与制度环境等内外部环境(Gomez-Mejia et al., 2014; 陈凌和吴炳德, 2014)以及独立董事比例与机构投资者等治理因素(Su & Lee, 2013;

^① [作者简介] 李荣,女,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琳,女,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玉明,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Gomez-Mejia et al., 2014) 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认为, 虽然上述研究已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度的探索, 但其仍有未尽之处: 其一, 已有研究多只以单一理论解释家族企业研发投资, 缺乏对理论的通盘整合; 其二, 已有研究较少将战略因素纳入权变情境之列, 特别是对不同的多元化战略(包括国际化、产品多元化及其组合)的作用尚乏研究。

针对上述未尽之处, 本研究选取了2010-2013年度沪深两市所有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 综合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与社会情感财富三种理论进行论述, 实证检验了我国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家族涉入程度与研发强度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单独和一并对于家族企业研发问题的权变影响。本研究可能的研究贡献包括: (1) 拓展了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所有权特征的认识, 综合三种理论对家族涉入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机理进行了分析; (2) 将国际化和多元化战略及其两者的共同作用作为情境因素, 研究了其对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 丰富了对影响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情境因素的认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家族涉入与研发强度

与非家族企业相比, 家族企业研发决策机制具有其复杂性。本研究将综合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综合分析家族涉入对研发强度的影响。

代理理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会导致委托-代理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 并进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为控制上述问题, 企业就需付出代理成本(Jensen & Meckling, 1976)。而在家族企业, 由于控制家族往往亲自参与经营或进行强力监督, 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较轻, 其对于研发活动的负向影响较弱, 控制家族因而更有意愿进行研发投资(Schmid et al., 2014)。但与此同时, 控制家族成员出于对家族企业绝对控制的意愿, 又会采用金字塔结构等控制权放大机制取得超额控制权(Morck et al., 2005), 由此产生股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出于私利考虑, 家族大股东可能利用隧道行为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财产和利润(Bhaumik & Gregoriou, 2010), 将用于研发投资的资金挪作他用, 从而降低研发活动的资金基础。除上述两类代理问题外, 家族企业所特有的家族成员之间以及家族与非家族成员之间的代理问题也会阻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于亲缘关系, 家族成员之间会存在利他主义倾向, 导致裙带主义的用人原则(Su & Lee, 2013), 造成员工胜任力的不足与非家族员工的不满, 进而削弱研发活动的人力资源基础。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由于控制家族与企业的相互渗透, 家族企业往往需服务于家族情感目标。保持家族控制是控制家族一切情感目标的基础, 而技术创新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 其失败可使家族声誉受损并削弱社会纽带(Gomez-Mejia et al., 2014; Chrisman & Patel, 2011), 进而威胁家族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因此, 为了保住自己的控制权, 家族控股股东往往更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经营模式(Konig et al., 2012), 进行低风险的短期投资活动, 不愿改变和创新。进一步地, 即使研发成功, 企业也面临由于技术变革而需要的人员更新, 这可能导致家族成员面临被淘汰的风险(Konig et al., 2012), 这也是家族企业所不愿面对的。

资源基础理论。动机和能力是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必备的两要素(James et al., 2014)。而资源基础理论则可从能力的角度分析企业的研发决策。对于家族企业来说, 其资源具有明显的家族性特征(Carnes & Ireland, 2013)。这种家族性特征使得家族企业社会网络稳固性强,

集团之间会形成内部资本市场，为集团企业进行研发活动提供一定的优惠资金（Lodh et al, 2014）。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一方面，家族企业的家族性特征使得其社会网络往往集中在很小的范围内，不利于获取广泛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家族控股股东为了维持家族的控制权不愿引进外部资金（Wu et al, 2007），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活动。

综上所述，三个视角对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提供了相悖的逻辑，但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家族控制的负面作用可能占据上风。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现代企业的存在时间普遍较短，其创业性特征尚明显，而具有创业特征的企业普遍第一类代理成本较低，这使得家族控制削弱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优势尚不明显；其次，由于中国文化较缺乏社会性信任，由“熟人社会”构成的社会网络就格外重要，这使得家族企业和社会网络规模上的局限被进一步放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

H₁：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研发强度越低。

（二）调节效应

1、国际化战略

国际化战略作为地区多元化的一种形式，与技术创新一道，同为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手段（薛有志和周杰，2007）。目前，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国际化战略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上（Tsao & Chen, 2012），而对其可能的调节作用关注较少，这成为现有研究的缺憾。本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对于其研发投资的间接影响兼具正反两个方面。

由于固有的家族性特征，家族企业资源来源范围局限，这对于需要高投入的研发活动来说是不利的。而国际化战略亦需要占用大量资源来开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与研发活动形成了资源竞争（Hill et al., 1992）。此外，国际化战略也会使企业面临高风险（宋渊洋和李元旭，2010），对于具有风险厌恶倾向的家族企业来说，在高国际化程度的情境中，企业更不愿意同时进行高风险的研发活动。即国际化战略对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是增强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_{2a}：国际化战略对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国际化程度越高，家族涉入对R&D的阻碍作用越强。

但另一方面，国际化战略又能够为企业带来异质性的知识和文化（张淑谦等，2014），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国际化战略使得企业目标市场范围更广，需求差异化现象更明显，企业需要进行研发活动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不同目标市场的需求。从家族情感的角度考虑，目标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使得即使新技术研发成功，旧技术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续下去，企业就不必立即淘汰依附于旧技术的家族成员；即使旧技术需要被淘汰，国际化战略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可以缓和由于技术革新而导致的家族人力资源淘汰，进而缓解由于家族情感原因对研发带来的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_{2b}：国际化战略对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国际化程度越高，家族涉入对R&D的阻碍作用越弱。

2、产品多元化战略

与国际化战略类似，产品多元化战略也是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模式（薛有志，周杰2007），而其对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同样是复杂的。

首先，产品多元化战略也需要大量投资且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对于风险厌恶的家族企业来说，在多元化程度高的情况下，不愿再承担同样高风险的研发活动（Gomez-Mejia et al.2010）。且有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会引起较大的代理成本（贾良定等，2005），对于家族企业的研发行为是不利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_{3a}：多元化战略对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多元化程度越高，家族涉入对R&D的阻碍作用越强。

然而，产品多元化战略需要新产品或服务的不断供给（Ansoff,1957），因此，实施产品多元化的企业就必须进行足额的研发投入来开发新产品。同时Lewellen（1971）的研究表明，多元化公司中不同产品所面临的风险各异，而其共同保险效应降低企业所面临的整体风险（薛有志，周杰 2007），从而使企业资金流更稳定。对于具有风险厌恶倾向的家族企业来说，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其共同保险效应可能会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_{3b}：多元化战略对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多元化程度越高，家族涉入对R&D的阻碍作用越弱。

3、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共同作用

如上分析，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皆可能对研发活动起间接作用。而在实际情况中，上述战略往往被家族企业同时采用，故二者可能一道对主效应起情境作用，对家族企业研发强度产生影响。

为了检验这一问题，本研究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_{4a}：国际化和产品多元化的共同作用缓和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负向关系。

H_{4b}：国际化和产品多元化的共同作用加剧家族涉入与研发之间的负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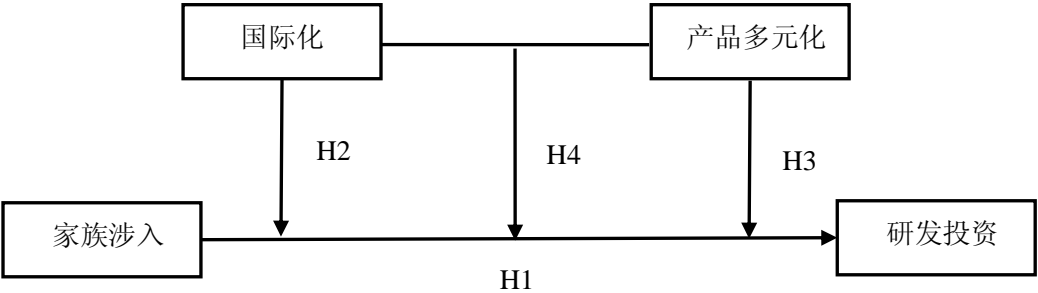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万德（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的具体筛选步骤如下：（1）选取2010-2013年度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2）选取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且控股比例大于10%（魏明海等，2013），且有家族成员参与高管团队（Gomez-Mejia et al., 2014）的样本，将之视为家族企业；（3）通过数据库进行变量间的匹配，删除有缺失值或明显异常值的样本。通过上述步骤，本研究获得了公司年度共

1745个观测值。

(二)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根据经典文献，本研究选取 Gomez-Mejia et al. (2014)的度量方法，用企业研发支出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来测量企业的研发强度（R&D_intensity）， 简称为 R&D。

2、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择家族涉入、国际化战略与多元化战略作为解释变量。

在家族涉入的度量上，通行的做法有二分度量和连续度量两种。前者通过设定所有权、管理权乃至代际参与阈值以将所有企业分为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两类^[7]，后者则多以家族所有权比例度量。我们认为，家族的涉入并不一定形成控制，如果采用二分法将企业简单的划分为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两类，不符合我们研究“家族涉入程度”的意图，并不适用于本研究情况。故本研究采取 Schmid et al. (2014) 的做法，使用实际控制家族持股比例衡量家族涉入（family_involvement），简称 FI，FI 越大，家族涉入程度越高。

为了进一步了解家族企业研发行为的情境变化，本研究还测量了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的程度。具体而言，参考 Gomez-Mejia et al. (2010) 的做法，本研究使用企业海外销售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ization），简称 IL，IL 越大，国际化程度越高；同时，参考王亮等（2009）的研究，使用赫芬达尔(Herfindal)指数法测量企业的产品多元化程度（hhi_diversitication），简称 HHI，HHI 越大，产品多元化程度越低。

3、控制变量

参照Chrisman & Patel（2012）以及陈凌和吴炳德（2014）等经典文献，我们选择了企业规模（企业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企业成立天数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盈利水平（ROA）、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数量/全体董事数量）以及年份（年度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表1给出了变量名称、代码以及各变量的定义。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	名称	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研发强度	RD	企业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
解释变量	家族涉入水平	FI	最终控制家族持有企业股权总和
调节变量	国际化战略	IL	企业海外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多元化战略	HHI	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Asset	企业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	Lnage	企业成立天数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盈利水平	Prof	ROA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数量/全体董事数量
	年份	Year	年度哑变量

(三) 研究设计

为检验家族涉入对研发强度的影响，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H1）：

$$RD = \alpha + \beta FI + \sum_{i=1}^6 \gamma_i Controls + \varepsilon$$

为检验国际化战略的调节作用，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H2）：

$$RD = \alpha + \beta_1 FI + \beta_2 IL + \beta_3 FI * IL + \sum_{i=1}^6 \gamma_i Controls + \varepsilon$$

为检验产品多元化战略的调节作用，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H3）：

$$RD = \alpha + \beta_1 FI + \beta_2 HHI + \beta_3 FI * HHI + \sum_{i=1}^6 \gamma_i Controls + \varepsilon$$

为检验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共同作用，构建了以下回归模型（H4）：

$$RD = \alpha + \beta_1 FI + \beta_2 IL + \beta_3 HHI + \beta_4 FI * IL + \beta_5 FI * HHI + \beta_6 IL * HHI + \beta_7 FI * IL * HHI + \sum_{i=1}^6 \gamma_i Controls + \varepsilon$$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1）本研究选取的主要变量标准差均较明显，说明所选变量具有相当异质性，而本研究使用的测度方法也是比较合适的；（2）所有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处于合理区间，说明研究受极端值影响较小；（3）样本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为4.1%，说明我国企业相当重视研发活动，但不同企业对研发重要性的认识差别很大，这体现为较大的标准差与取值区间；（4）样本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平均占到总销售额的20.3%，说明我国部分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也体现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5）样本企业的产品多元化赫芬达尔均值为0.78，且在原始数据中有33%的样本低于0.7的阈值，说明样本企业兼有主营业务突出的企业和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取样较为全面。

表2 描述性统计

名称	代码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分位数	最大值
研发强度	R&D	0.041	0.036	2.11e-06	0.024	0.034	0.049	0.298
家族涉入水平	FI	0.358	0.157	0.100	0.229	0.337	0.464	0.854
国际化	IL	0.203	0.210	5.04e-6	0.033	0.129	0.313	0.799
产品多元化	HHI	0.777	0.239	0.213	0.551	0.879	1	1
企业规模	Asset	21.415	0.868	18.878	20.800	21.301	21.892	25.400
企业年龄	Lnage	8.206	0.496	6.597	7.916	8.299	8.538	9.151
财务杠杆	Lev	0.348	0.200	0.015	0.190	0.323	0.492	1.806
盈利水平	Prof	0.047	0.053	-0.454	0.021	0.045	0.070	0.494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0.372	0.054	0.250	0.333	0.333	0.429	0.667
--------	-------	-------	-------	-------	-------	-------	-------	-------

（二）多元回归结果

在描述性统计之后，本研究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在模型1中，本研究代入了控制变量，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13.9%，说明经典变量已经能部分解释样本企业的研发投资问题。

在模型2中，本研究代入了家族涉入（FI）变量，可以发现FI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于R%D（ $\beta=-0.021$ ），说明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研发强度越低，这也支持了前述H₁的推测。即家族企业第二类和第三类代理问题的突出、保护家族情感目标的需求以及企业资源固有的家族性特征使得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研发投资强度越低。

在模型3中，本研究代入了国际化程度（IL）及其与家族涉入的交互项（FI*IL）以检验企业跨国经营的后果，可以发现，IL在1%水平上负相关于R&D（ $\beta=-0.01$ ），而FI*IL则在10%水平上正相关于R&D（ $\beta=0.002$ ），说明虽然家族涉入与国际化战略会分别的阻碍企业研发投入，但在高国际化企业，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作用减弱，这说明与国际化战略所带来的风险、资源竞争等不利因素相比，其所带来的异质性的知识、资源以及缓解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家族成员胜任力不足而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缓和了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H_{2b}因而得证。

类似地，在模型4中，本研究则检验了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后果，可以发现HHI与R&D并无显著相关关系，而FI*HHI则在10%水平上正相关于R&D（ $\beta=0.002$ ），说明产品多元化战略可能进一步加剧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效应，即产品多元化战略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以及形成的代理成本等问题，在其对家族涉入与研发强度关系的影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阻碍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这支持了H_{3a}的观点。

最后，在模型5中，FI与R&D依然在1%水平上保持负向相关（ $\beta=-0.02$ ），而FI*IL*HHI则在10%水平上与R&D（ $\beta=-0.002$ ）显著负相关，说明同时采取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可以缓和家族涉入对研发投入的阻碍作用，H_{4a}因而得证。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H1）	模型3（H2）	模型4（H3）	模型5（H4）
控制变量					
Asset	-0.002** (-2.17)	-0.002** (-2.30)	-0.003** (-2.47)	-0.002** (-2.33)	-0.003** (-2.52)
Lnage	-0.005*** (-3.14)	-0.007*** (-3.86)	-0.007*** (-3.94)	-0.007*** (-3.86)	-0.007*** (-4.00)
Lev	-0.055*** (-11.41)	-0.058*** (-11.86)	-0.058*** (-11.82)	-0.058*** (-11.86)	-0.058*** (-11.93)
Prof	-0.029* (-1.79)	-0.027* (-1.71)	-0.030* (-1.88)	-0.028* (-1.73)	-0.031* (-1.94)
Indep	0.014 (0.94)	0.022 (1.48)	0.021 (1.39)	0.022 (1.50)	0.022 (1.46)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自变量					
FI		-0.021*** (-4.00)	-0.020*** (-3.65)	-0.021*** (-4.03)	-0.020*** (-3.65)
调节变量					
IL			-0.010*** (-2.62)		-0.010** (-2.53)
HHI				-0.001 (-0.35)	0.000 (0.00)
二维交互效应					
FI*IL			0.002* (1.70)		0.002 (1.52)
FI*HHI				0.002* (1.93)	0.001 (1.50)
IL*HHI					0.001 (1.57)
三维交互效应					
FI*IL*HHI					-0.002* (-1.65)
Adj R-squared	0.139	0.147	0.150	0.147	0.152
F	36.23***	34.26***	28.91***	28.40***	21.77***
N	1745	1745	1745	1745	1745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研究选取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1745个观察值作为样本，检验了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并引入国际化战略、产品多元化战略以及两者的共同作用作为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关系的情境因素。研究发现：（1）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研发强度越低；（2）国际化战略可以缓和家族涉入对研发投资的阻碍作用；（3）产品多元化战略则会加剧家族涉入对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4）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的组合可以缓和家族企业的研发约束。

上述结论有以下理论和实践启示：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同时考虑了国际化战略与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其组合对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关系的情境影响，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即国际化战略可以缓和家族涉入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产品多元化战略则加剧了上述负向关系，而两者的组合也会缓和上述负向关系。这提示了其他研究者在关注环境因素、治理因素对研发投资的情境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企业自身其他战略的影响，尤其是异质性的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和产品多元化战略）对于企业研发等各项决策的不同作用。

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认为:(1)家族企业应正确对待其特有的代理问题,建立适合自身长远发展的治理政策,减少代理冲突对企业研发意愿的影响;同时应建立正确的家族企业控制及传承观念,不能为保持家族控制权而造成企业资源来源局限、不愿进行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带有一定风险性的研发活动。(2)家族企业应谨慎考虑“家族王朝”的建设方式,正确对待扩大营业领域与地区等战略与保证家族企业长久发展的研发投资,平衡好“扩大面”与“深化点”的关系。

本研究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使用海外销售额与销售收入之比度量国际化战略,而国际化战略只是地区多元化的一个维度,这可能忽略了不同样本企业目标市场国际数量差异与国内地区多元化差异。这启示后来者可以进一步的使用国内数据或更细致的国际数据,对地区多元化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2)本研究使用股权比例度量家族涉入的程度,这可能忽略了控制家族的其他涉入方式(如管理权涉入),特别是对已形成绝对控股的家族控制企业,其之间的股权差异可能并无实质区别。这启示后来者可以进一步细化家族涉入的类型,并设计综合指数以将家族涉入进行整合量化。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参考文献

- [1] Ansoff H I. Strategies for diversific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57, 35(5): 113-124.
- [2] Bhaumik S K, Gregoriou A. 'Family'ownership, tunnelling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0, 24(4): 705-730.
- [3] Block J H. R&D investments in family and founder firms: An agenc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2): 248-265.
- [4] Carnes C M, Ireland R D. Familiness and innovation: Resource bundling as the missing link[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6): 1399-1419.
- [5] Chrisman J, Patel P. Variations in R&D investments of family and non-family firms: Behavioral agency and myopic loss aversion perspectiv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amj. 2011.0211.
- [6] Chrisman J J, Fang H, Kotlar J, et al. A note on family influence and the adoption of discontinuous technologies in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 [7] Gomez - Mejia L R, Makri M, Kintana M L. Diversification decisions in family - controlled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2): 223-252.
- [8] Gomez - Mejia L R, Campbell J T, Martin G, et al. Socioemotional wealth as a mixed gamble: Revisiting family firm R&D investments with the behavioral agency model[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6): 1351-1374.
- [9] Hill C W L, Hitt M A, Hoskisson R E. Cooperative versus competitive structures in related and unrelated diversified firm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3(4): 501-521.
- [10] James H S. Owner as manager, extended horizons and the family fi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1999, 6(1): 41-55.
- [11] Jensen M, Meckling W. l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J].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m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
- [12] König A, Kammerlander N, Enders A. The family innovator's dilemma: how family influence affects the adoption of discontinuous technologies by incumbent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 amr. 2011.0162.
- [13] Lodh S, Nandy M, Chen J. Innovation and family ownership: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 India[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22(1): 4-23.
- [14] Lewellen W G. The ownership income of management[J]. NBER Books, 1971.
- [15] Randall Morck, Daniel Wolfenzon, Bernard Yeung.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entrenchment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9:655-720.
- [16] Schmid T, Achleitner A K, Ampenberger M, et al. Family firms and R&D behavior—New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1): 233-244.
- [17] Su W, Lee C Y. Eff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risk taking in Taiwanese family firms during institutional reform[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0(3): 809-828.
- [18] Tsao S M, Chen G Z.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3): 617-642.
- [19] Wu Z, Chua J H, Chrisman J J. Effects of family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on small business equity financ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7, 22(6): 875-895.
- [20] 陈凌, 吴炳德. 市场化水平, 教育程度和家族企业研发投入[J]. 科研管理, 2014, 7: 006.
- [21] 贾良定, 张君君, 钱海燕, 等. 企业多元化的动机, 时机和产业选择——西方理论和中国企业认识的异同研究[J]. 管理世界, 2005 (8): 94-104.
- [22] 凌玲, 卿涛. 培训能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吗——可雇佣性和期望符合度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3): 127-139
- [23] 龙文滨, 宋献中.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述评[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3): 17-24.
- [24] 宋渊洋, 李元旭. 控股股东决策控制, CEO 激励与企业国际化战略[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 4: 4-13.
- [25] 王亮, 刘敦虎, 彭青峰, 等. 多元化经营与企业风险关联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09 (20): 164-166.
- [26] 魏明海, 黄琮宇, 程敏英. 家族企业关联大股东的治理角色——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13 (3): 133-147.
- [27] 薛有志, 周杰. 产品多元化, 国际化与公司绩效[J]. 南开管理评论, 2007, 10(3): 77-86.
- [28] 张淑谦, 傅建敏, 张铁山.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国际化发展对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31(18): 131-135.